

消失的手工金属雕刻与工匠精神(下)

刘源隆

分毫不差： 打破美国的技术垄断

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孝正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发现美国有一种常年固定发行的“金邮票”，大小尺寸与纸质邮票一致，但却是纯金的。周孝正觉得很新鲜，就在当地购买了一件纪念珍珠港事件题材的金邮票，并带回国内。

周孝正的姐夫吴建坤正是著名的邮票设计家、中国邮票公司设计组的组长，曾设计过“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纪念邮票、“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等。当时，吴建坤正在设计“敦煌组票”，当他看到了周孝正带回的美国金邮票后，大受启发，生产金邮票的想法与甘肃邮票公司一拍即合。甘肃邮票公司便向邮电部申请了中国第一个生产金邮票的批文，以“唐飞天”为题材。

可是问题随之而来，甘肃邮票公司先后找到沈阳造币厂、上海造币厂等，得到的答复都是“做不了”，无奈之下又去求教美国的制作公司，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不可能做出来，全世界只有我们公司可以制作，英国女王、日本天皇的生日纪念金邮票都是我们做的，你们也可以委托我们来制作。”

甘肃邮票公司对此并不甘心，最终找到了北京模具厂的刘燕群，他对于中国首枚“金邮票”的工艺难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一口承担下来这一工作。“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这太吸引我了。”他在回忆时也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

刘燕群当时只拿到了一张印好的邮票，与一张敦煌壁画的照片作为资料。1994年社会上扫描仪、数码相机、电脑设计等一切设计手段都没有，只能靠胶片照相机对图稿进行翻拍缩放，面对经过数千年已产生腐蚀的壁画图案，刘燕群运用高超的技艺，最终在钢材上雕刻出与原邮票一模一样的图案，分毫不差。

图案解决了，问题还有很多。邮票上“中国邮政”、“10分”字样是防伪的，在任何印刷



中国第一枚金邮票“唐飞天”

体字库中都没有，如果把字放大，在当时的技术手段下，字就模糊了。刘燕群找到吴建坤，吴建坤宽慰他：“就放大了刻吧，差一点没关系。”可工匠的执着让他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他开始四处寻找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无意中刘燕群在潘家园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邮票设计手册》，里面对所有邮票齿孔尺寸、字样尺寸都记载详尽，他花了2元钱买下了这本设计资料。也正是这一资料让刘燕群的雕刻与邮票完全一致。吴建坤看到雕成的模具，感到极为惊讶，并询问他是怎么雕刻的，当刘燕群拿出《邮票设计手册》时，吴建坤更惊讶了：“这本资料全国只有五册，我如果要看，也得去中国邮票公司资料室借阅，拿不出来。”

模具雕刻完成，压制又出现问题。如果直接用金子压制，效果很好，但是成本太高。进而，甘肃邮票公司又找到美国方面，向他们购买金料。美国仍旧表示对于中国制作金邮票努力的不屑，提供了一条样料。这条样料只是一条金色的塑料条，拿到样料后没有人知道该怎么使用。

刘燕群看到样料乐了。他一眼认出这是印刷中烫金的材料，只是中国一直使用金色的电化铝，而美国的料是纯金。“我有一个习惯，每雕刻一个模具，都要去观看模具使用的方式情况，当时刚刚有人美社雕刻中共中央

政治局七常委名片上的国徽，在印刷厂我了解了印刷的一些工艺。”刘燕群说，这是师傅一直告诫他的，作为手艺人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的工作里，要尽可能多地去了解不同的工艺、工种，才能形成艺术底蕴的积淀。

最后，美国的公司看到了中国的金邮票后感到的只是不可思议，他们提出一个要求，即留给他们一个样品，以此证明中国金邮票所用的材料是他们自己生产的。

锱铢必较： 中国徽章的最高水平

199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召集各部委，以及上海造币厂、沈阳造币厂、北京工美集团在中南海开会商议关于制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宜。中央工艺美院对奖章的设计提出了上千份稿件，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定稿。

奖章的设计图案由长城、国旗、橄榄枝、宝剑式光芒线等元素组成，且规定每枚奖章由500g黄金压制。这一设计稿虽然是平面图，但却难倒了上海造币厂和沈阳造币厂。“当时他们只能运用造币的工艺，把奖章做成圆形的钱币形式，而且铸币的浮雕非常浅，根本达不到要求，而这一重要任务也就交给了北京工美集团。”时任北京工美集团总工程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文本行是做牙雕的，但怀着学习其他不同工艺的工匠精神，他还学会了玉雕、花丝镶嵌以及首饰制作，正是对于多种工艺的了解，让他有了制作顶级水平奖励奖章的信心。面对这次的徽章制作，王树文又找到了金属雕刻工匠刘燕群。两人对设计稿又进行了二次创作，运用金属雕刻、首饰制作的三重工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呈现浮雕高度达10毫米，并在黄金材质上呈现出7种纹理颜色的功勋奖章。

制作的过程非常顺利，但是工匠的执拗却让故事变得一波三折。在设计图纸中，奖章的背面要雕刻表彰大会的日期“1999年9月18日”。刘燕群在雕刻模具时，将其改为

“1999.9”；此外，为了表现奖章的材质，按照国际惯例还在背面雕刻了“24K金”的字样。

当制作好的样品奖章被送到中南海时，“在场的很多部长都吓坏了，有会议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这您也敢改？这是写进国务院会议纪要的内容，而且有着明确规定，怎么能擅自更改呢？’”王树文对于当时的情景感觉历历在目。“就这件事，先后四次叫我去开会。”

但是刘燕群对于自己的改动毫不动摇。“‘九一八事变’的日子是国家的耻辱，在我们国家至高荣誉的奖章上不能刻；而且每个奖章都是一斤重的纯金打造，只有写出24K才能让后人知道它的尊贵与荣耀。”王树文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是迟迟得不到领导的批示，“此时距离表彰大会的召开已经接近了。”

工匠的坚持最终打动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他出面指示，这件事情，工匠们没有错误。样品通过，开始制作，表彰大会如期举行。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只制作了24枚，其中实发23枚，1枚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收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了解了奖章的制作过程后，对奖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无论是材质，还是工艺，这一奖章标志了中国徽章的最高水平。而制作中工匠们对毫厘的坚持，也正与中国“两弹一星”辉煌事业中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一脉相承。

如今，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俱往矣。敢于挑战困难的金属雕刻工匠们在最后与计算机的对垒中宣告失败。“今后市面上能看到的金属雕刻工艺品就都是电脑做的了。”于2014年退休的刘燕群是这一领域里奋战到最后的工匠了。他认为电脑固然强大，但关键还离不开操作它的人，“如果操作的技术人员能具备一定美术知识，那电脑雕刻出的活儿就更无懈可击了。”至于师徒间代代相传的工匠精神，他也十分乐观，“有生命力的东西就消失不了，消失的只是这项工艺，而这种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各行各业无处不在。”

摘自《小康》2016年3月上

一生一首翰墨诗 ——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二十三、冬去春来

改革开放的初期，书画渐渐走向了市场。当时的购买者主要是外国旅游者，专门对外经营的上海友谊商店也开始向沪上一批书画家征稿。虽然刚开始时一张三方尺大小的书法作品也才五元钱，但随着使书法家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记得周慧珺得到的第一笔稿费为六十元，是胡问遂先生亲自登上周慧珺家狭窄漆黑的楼梯，送至周慧珺手中的。这是一叠崭新的纸币，在今天看来犹如汪洋水滴，但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分量却很重，这证明了他们执著的追求、辛勤的付出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当即，周慧珺用这笔稿费下了楼打了酒菜，师友间把酒畅谈至夜深，仍觉意犹未尽。

正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之际，1979年的早春，周慧珺的父亲周志醒因长年胃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82岁。看着被病魔消耗殆尽的父亲，周慧珺忍不住泪如雨下。想到父亲年轻时布武于收藏舞台、舞剑在商道之间，晚年却凄凉度日，甚至卖废纸谋生，命运无常的感觉涌上心头。整整四十年的父女亲情，就要在今日戛然而止，怎能不叫人肝肠寸断？同样，在父亲心中最放不下的始终是这个病魔缠身又未嫁的“囡宝”，临终前他把所有子女召集到身边嘱咐道：“你们做哥哥姐姐的一定要多关心照顾患病的妹妹，家里遗留的东西，包括书画藏品悉数留给囡宝，好让她有个依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父亲的愿望并没有兑现，但这些并不妨碍周慧珺对父亲的感情。告别了父亲，周慧珺继续照顾着患病的老母亲。四年后，患有老年痴呆疾病的母亲也终于驾鹤西去。

斯人已逝，生活却要继续，周慧珺也将面临新的人生。先是日本各民间书社而非官方人士纷纷前来我国与中国书法家进行交流与切磋，为接待大批的日本民间书法家，画院对接待工作进行了非常细致周到的安排，特意在画院内腾出一间接待室，配上全套的红木

桌椅、摆上笔墨纸砚以作交流之用。由于中国书法界有成就的女性是凤毛麟角，而偏偏日本多有知名女性书家，故而周慧珺时常迎来送往、切磋技艺。

到了1979年5月，应一些日本民间书画社邀请，我国也开始外派专业书画人士赴日本交流学习。第一批代表书画界访问大阪的成员都是前辈大家，如谢稚柳、沈柔坚、顾廷龙、胡问遂、叶露园等人。

1980年，周慧珺迎来了出国交流的机会。日本北陆书道院邀请上海中国画院回访日本，并且团友周慧珺。北陆书道院是日本著名的书法团体，专门从事书法教育和书法艺术的交流工作，拥有一批造诣很深的书法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北陆书道院在理事长青柳志郎的率领下曾十次来沪访问，并举行书法展览，因而在当时上海书法界知名度很高，很多中青年书法家都是应北陆书道院的邀请才首次跨出国门的。不久，周慧珺就和文化局的两位官员、上海图书馆的一名翻译组团前往北陆书道院所在地日本富山县。

说是书道院，其实就是一栋传统式样的日本私人住宅，面积不大，外观却颇为清雅。应当说，日本书法界人士对来自中国的书法才女周慧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和诚意，观看周慧珺现场作书都是瞪大双眸，表情异常地专注、认真。有两位女书家还仔细地为她拍照留影，并反复表示这是供回家研习之用。

短短几天的日本之行让周慧珺看到了书法在日本的普及和受重视程度，尤其发现日本书法家的创作水平相当高，创作意识和创作思想都非常先进。日本书法家大多站立挥毫，而且以刷大字为主，有别于中国书法家惯于坐着临帖，写小字。对于中国人讲究的执笔方法，日本书法家更是判然有别，多元化的执笔法凸现出他们的随性与洗练。但周慧珺并不妄自菲薄，她深刻认识到：“日本书法这二三十年间进步很快，也积极向外交流。第一次去日本就是北陆书道院邀请的，去了一周，发现了许多值得借鉴学习的东西，尤其是他们的群众书法和女性书法的地位非常高。但我们也不用妄自菲薄，现在有些人过于自轻自贱也不好，毕竟日本书法的本源还是在中国。”

10.南京条约以后

南京条约既经签订，清朝政府急忙搜括库款和商民私财银五百五十万两付清第一期赔款，10月初英军先后撤离下关、镇江、吴淞等地，驶返广东。道光帝下令各省一面撤兵复员，一面加强战备——添造兵船和购买大炮。

此外必须一记的，是对于战争负责官员的惩处。首先受惩处的是牛鑑，牛鑑本只是投降派的追随者，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不久就被革职拿问，并判处死刑，定秋后斩首（秋后斩首照例不执行）；而负责签订南京条约的投降派首领耆英、伊里布两人不但受惩处，反而继续得势。其次受惩处的是广东、浙江战争失败的负责人——弈山、弈经、文蔚三人，也被革职拿问，判处死刑，定秋后斩首，但一年后又复起用担任边疆要职。唯一受惩处最重的是弃守镇海、宁波的余步云，他以“见敌轻退”的罪名，被判处立即斩首；“见敌轻退”的并不只是余步云一人，斩余步云显然含有替投水自杀的裕禄报复的意思。还有在战争进行中就被革职拿问的琦善，本也已判处死刑，定秋后斩首，但和弈山一样，两年后又出任边疆要职。至于充军到新疆伊犁的邓廷桢，两年后被释放回籍，林则徐则一直等到四年后投降派对外交涉告一结束，才被释放回京。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所有开放五口通商和协定关税税率等项，还待继续与英国方面商谈，这个责任自然落在耆英和伊里布两个人的身上。10月17日道光帝任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与英国香港总督璞鼎查（璞鼎查因功出任第一届香港总督）商谈一切；又任命耆英为两江总督，办理江苏、浙江、福建各省通商事务。伊里布于1843年1月10日到达广州，与璞鼎查在黄埔会见，不久即因忧愁病死出缺，仍由耆英出任钦差大臣——以后任两江总督直到1847年。

耆英于6月4日到达广州，6月23日亲自到香港与璞鼎查会谈，商定中英通商章程（7月22日在香港公布）和通商附粘善后条款（10月8日在虎门签字又名虎门条约）给南京条约作了许多重要的补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 (一) 所有进出口货物关税一律值百抽五，开关税协定的恶例；而且税款由英国领事担保，种下了以后外人代管海关的因子。
- (二) 中英两国人犯罪，各按本国法律惩处，开领事裁判权的恶例。
- (三) 所有通商口岸，每处停泊英船一只，种下了以后外船航行内河的因子。
- (四) 所有通商口岸，允许英人携眷属居留，并划定居留地界，由英人自行租赁房屋或租地建屋，这就是租界的起源。

(五) 中国如给与别国某种权利，也得以同样权利给予英国，这就是片面最惠国条款的开端。南京条约的签订，引起了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要求。首先是美国，美国政府外交代表顾盛（Caleb Cushing）于1844年2月24日到澳门，致书耆英要求允许美人在新开各口岸通商，耆英于6月17日到澳门与顾盛会谈，商定中美通商章程（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字，又名望厦条约）。在中美通商章程中，清朝政府除了承认美国获得和英国同样的通商权利外，并对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条款等项，作了比中英通商章程更明确的规定。

其次是法国，法国政府外交代表拉格尼（Theodore de Lagrene）于1844年8月13日到达澳门，9月29日与耆英在澳门会谈，商定中法通商章程（10月24日在停泊黄埔的法国兵船上签字，又名黄埔条约），法国也获得和英美两国同样的通商权利。又因法国对华商务较不发达，所以特别注重传教权的争取。清朝政府应拉格尼的要求，解除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禁律，允许法国教士在新开各口岸传教，允许中国人听讲人教。

在这以后，葡萄牙、比利时、瑞典、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国政府也都派代表来到广州，清朝政府一律允许在新开各口岸通商。中英通商章程公布以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岸都已在1843年、1944年内先后开放，并设立英国领事馆。

鸦片战争始末

司马牛

